

文革化下的香港知識分子與大眾刊物： 六七暴動中的《萬人傑語錄》¹

李祖喬

摘要

香港的六七暴動研究，主要圍繞左派（暴動者）和港英政府（鎮暴者）的互動，很少探討當時市民的意識和活動。本文以暴動時期的暢銷刊物《萬人傑語錄》來填補此空缺。本文展示該刊物如何以政治諷刺去回應《毛澤東語錄》，也訪問了一些讀者，揭示市民如何透過作者萬人傑而集會結社，也分析香港居民在暴動時期所展現的能動力。



圖一：萬人傑語錄。圖片來源：Pun，〈萬人傑點滴〉

1967年，廣東和香港的左派人士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在當時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發動了「反英抗暴」的鬥爭，後來被稱為「六七暴動」。左派對抗港英政府時，往往高舉紅色小書《毛澤東語錄》，以它作為精神支柱和身份象徵；很快，一位文人也出版了一本小書去抗衡左派。報人陳子雋本來在右派媒體寫言情小說，當時忽然論政，以「萬人傑」為筆名

¹ 感謝幾位匿名的審稿人和編輯悉心閱讀本文，提供大量具體而有建設性的修改建議。

出版《萬人傑語錄》（下稱《萬語錄》）。漫畫家嚴以敬（阿虫）設計了綠色的封面，畫了一個大拳頭，伸向「左仔」（圖一）。²

《萬語錄》讓我們重新思考六七暴動。雖然現時已有不少著作揭示當時左派和港英政府如何互動（例如張家偉；Bickers and Yap；Ip；許崇德；周奕；強世功；程翔）；相比之下，從市民角度出發的研究卻很少。歷史學家高馬可（John Carroll）便認為暴動時期的「大眾如何處理長期的焦慮和不安」尚未被系統性地分析（81）。本文旨在通過《萬語錄》嘗試填補此空缺。雖然刊物由右派文人出版，但它在文化市場上非常暢銷，所以它不純粹是一位右傾知識分子的作品，而是同時表達了一些香港市民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Williams 128-35）。本文分析《萬語錄》的文章，並訪問當時的讀者，以解說萬人傑如何用文字去確立一種以地方為本的反共意識，更使讀者集會結社，顯示出市民表達自身取態和互相連結的能動力（agency），也讓我們從港英政府和左派之外的第三視角去理解 1967 年的香港。

是以，筆者的關懷和進路，均不同於現有六七研究的主流。回歸後出版的六七研究較關注殖民者和反殖民者的鬥爭，傾向簡化市民的反應，並指出市民在暴動時期「人心惶惶」，然後被港英政府「洗腦贏心」，所以今天的香港尚未「人心回歸」。但暴動時期香港居民的意識和活動卻往往被一筆帶過。舉例，六七史的專家張家偉認為當時的市民多保持沉默，最多只是對殖民政府「被動地支持」（passive support），但他卻沒具體解釋「支持」如何「被動」（《六七》頁 193）。要繼續探索「支持」何以發生，可從一本反左的暢銷書入手：一位知識分子把觀念寫成迎合別人心意的文字；而市民感到文字說出心中所想，以文化消費（而非主動作政治抗爭）來表達「支持」。³本文會以兩個角度去重構此過程：一，先把《萬語錄》視為一份由文字構築而成的文本（text），分析它作為文字媒介的性質，即探討其文本性（textuality）；二，把它視為被多人消費的商品，探討它如何調節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即探討其社會性（sociality）。

反共的暢銷書：地方文人的笑料

萬人傑的政論，先在《星島晚報》連載，其後很快被輯錄成《萬語錄》及其續集《左道旁門》（下稱《左道》）。萬人傑公開聲稱《萬語錄》非常暢銷——它賣三元，貴《毛語錄》三倍，但不足兩月便賣了三版，使他得出版續集應市（《左道》頁 2）。當然，作者自己提供的資料無法完全證實一份刊物有多暢銷，但電視及新聞報導在當時尚未普及，紙

² 「左仔」是廣東話，萬人傑用它來指左派的小混混。此封面形象源自當時的新聞圖片。萬人傑常常從報紙看到，警員搜查左派機構時，左派得「跔地」（蹲在地上）（《左道》頁 159）。

³ 當時的民間如何生產及消費文化產品，往往不是研究重點。一些左派文藝的研究者（李少恩，頁 115-40；張詠梅，頁 141-67）曾經簡單提及暴動時期的左派文化產品。

媒力量很大，而《星島晚報》在當年很可能是銷量第一，讀者極多。⁴《萬語錄》是從該報的萬人傑專欄中篩選出來的精選文章，大概是作者和編者都認為它們最能打動讀者。故此，《萬語錄》的文章也承載了市民在暴動時期的取態。

《萬語錄》的作者性 (authorship) 和文類 (literary genre) 均顯示它繼承了國民黨的反共意識，但更強調地方性。萬人傑在〈我的立場〉一文便如此自我定位：

許多讀者來信，問我為甚麼以前並未見你寫過隻字反共文章 [.....] 中共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慚愧得很，我並未加以隻字批評，這有如大部份香港市民一樣，這大陸的事，並不過份關心。可是，左派的投機份子 [.....] 在這裡搞鬥爭 [.....] 置四百萬市民的生活於不顧 [.....] 我也是在這情況下無法壓制自己的情緒 [.....] 我不是左派誣織的甚麼「美特」、「蔣特」。我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年，和「美帝」既無聯繫，未受到美鈔津貼，也和「蔣記」毫無交情，未到過台灣一遊，一個台灣官都不認識，更談不到受他們收買。我過著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完全是自己努力 [.....] 有賴於香港的安定和自由發展的機會。(《萬語錄》頁 198)

以上的自述，可見萬人傑以地方為本。他稱自己突然從「言情」轉為「論政」、以筆名「萬人傑」高調反共，不是因為關心「大陸的事」，而是氣憤左派破壞了四百萬市民的生活。⁵他也強調自己的資產是個人努力所得，不涉美國和國民黨資助，表達了對港英秩序的信賴。萬氏在很多文章中都自認中國人，但他更常用「四百萬市民」一詞。他期望國民黨反攻大陸，但在暴動時期更關注香港的地方秩序和生活方式。當然，萬人傑有可能欺瞞讀者，虛構出其不涉黨國的作者性。但左派史的專家周奕曾指暴動時期的國民黨不成氣候，沒角色可言 (頁 371-72)。⁶再說，假如萬人傑是刻意欺瞞，反倒更證明市民對國民黨好感不多。筆者訪問過一位 90 歲的萬人傑讀者 Y：他指自己在 1960 年代初因為不滿中共而從廣東逃到香港，但「假如萬人傑是美國或國民黨代言人，我肯定會因為他有背景、不純粹而不支持他。」⁷不論萬人傑的「去國民黨化」是真心還是假意，他的文字能反映和確立一些市民重視地方多於黨國的傾向。

此傾向也在文類的取捨上可見。萬人傑開宗明義寫道：

⁴ 根據香港無線電視第一任業務經理的回憶錄，在 1960 年代初，沒有市場調查這回事；1965 年，可能是香港史上第一份市場調查報告指，最多讀者的報章是《星島晚報》(李雪廬，頁 29)。1967 年跟 1965 年的報章市場，大概相差不遠。

⁵ 此轉向在《萬語錄》被反覆提及。陳子雋的太太也曾如此憶述 (陳何智明，頁 9)。但不論是萬人傑的出版物、還是我訪問過的讀者，都沒有或無法解說陳子雋為何取名「萬人傑」。值得一提的是，在 1950 年代的黃飛鴻電影，黃飛鴻的對手萬人敵，有位兄弟叫萬人傑。

⁶ 這可能跟 1956 年的雙十暴動過後，國民黨勢力衰退有關。

⁷ 筆者訪問，2017 年 3 月 16 日，青衣。

《萬人傑語錄》是一本怎樣的書？它不是羅曼羅蘭語錄有深奧的哲理，也不像《毛澤東語錄》可鎮壓牛鬼蛇神 [.....] 它，是一本充滿笑料的書。希望每個讀過的人，都會捧腹大笑一場。（左仔除外，特此聲明）。[.....] 我出版這本書，目的在供給大家笑料，願大家齊聲同笑，長命百歲！（《萬語錄》頁1）

書中雖沒解釋為何要以笑料去跟《毛語錄》在香港的文化市場競爭，但陳子雋本來就在廣東負責大眾媒體和流行文化的生產。他於1917年生於廣東，原籍番禺。1930年代後期起，他在香港以「俊人」為筆名，寫了二百本言情小說，其中一些被改編成電影，而他亦曾在亞洲影展獲最佳編劇。二戰中，他北上韶關任《大光報》總編，戰後返港任職《工商日報》和《星島晚報》。以簡單易明的娛樂去包裝國民黨的反共意識，是他的老本行。

可是，萬人傑偏好娛樂化的政論，不單是延續他在右派媒體的工作經驗，也同時標示他不滿國民黨過份僵化及脫離地方群眾。因萬人傑大受歡迎而在1967年底推出的《萬人雜誌》，其發刊詞便指「我們的宗旨，站穩反共立場，但不唱反共八股 [.....] 發表的文章，都是輕鬆、幽默、諷刺」（《萬人雜誌》頁1），也提出其文藝原則「大題小做、高調低彈」和「作者、編者、讀者三結合」（《萬人雜誌》頁30）——多寫廣東話和娛樂化的內容、多回應讀者來信和發動群眾募資（即所謂「眾籌」）。萬人傑也沒有跟隨國民黨在1966年為回應文化大革命而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萬人雜誌》出版前數月推出的《萬語錄》，其實是萬人傑不滿國民黨文藝原則的起點，試圖以娛樂化的文字遠離反共八股，凝聚地方為本的反共意識。⁸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說法能闡釋這點。他認為，笑話可分為無害的笑話（innocent jokes）和有傾向的笑話（tendentious jokes），後者能幫人抒發無意識的欲望——它們被外在因素壓抑、無法被表達。例如，懷有敵意的笑話（hostile jokes）就是透過另類語言去抒發一些（法律不容許的）攻擊別人的欲望（Freud 97-98）。從此角度看，《萬語錄》可算是對左派懷有敵意的笑話，而那些使笑話出現的壓抑性因素，則是港英的法律秩序和國民黨的宣傳八股——港英的法律不容許民間武鬥，所以要用文字去回擊左派；國民黨的「復興中華文化」和「反攻大陸」等宣傳八股，又以黨國而非地方為本位。萬人傑受制於兩套「超我」（super-ego）的道德和語言秩序，要規避地方法律和黨國的文化領導權，選取了笑話作為其另類的語言去壓制左派。

至於笑話壓制左派的方法，則是描繪左派的言行跟其崇高的理想主義脫勾。以下會討論兩個例子。

⁸ 有學者指，甚或是笑話，視乎特定文化如何想像何為嚴肅的論述（serious discourse; Mulkey 22-38）。從這點看，「反共八股」就是嚴肅的論述。1967年的《萬人雜誌》常常表達對國民黨的不滿，偶爾諷刺它無能和貪腐，例如接收一些被香港市民討厭的左派。

左派的喜劇化：抗暴者到演員

《萬語錄》不談宏大抽象的「主義」、「制度」或「路線」，而是集中描寫及取笑左派分子在地方上的言行舉止。這篇叫〈象徵式〉的文章，便諷刺左派的文鬥：

左派的「象徵式罷工」很有幽默感。我老萬一向提倡「幽默」，對「象徵式罷工」深表同情 [.....] 罷工一小時，四小時，一天，一半罷，一半不罷，最大目的是維持面子 [.....] 用不著那麼大筆國家公帑，有數得計，動員一個人要二三十，十個二三百，千個便二三萬 [.....] 是一大筆開銷。雖然國貨源源運來，換取不少外匯，如此花費，亦太浪費。當初如能改為象徵式，派一兩個人叫叫口號，唸唸語錄，象徵式的貼一張大字報，必不會鬧出事；就算出事，派一位左派大亨，坐平治汽車去總督府，提出象徵式的抗議 [.....] 這時，左派報紙可說是「反迫害鬥爭的偉大勝利」。
(《萬語錄》頁 15-17)

這類文章在《萬語錄》很常見，嘲諷社會主義表面上追求理想，背後卻充滿經濟上的計算。罷工沒有被呈現為一種浪漫的抗爭，而是一場經濟上十分理性的表演：表演的支出，來自左派於香港販賣國貨而賺取的外匯；表演者付出的勞力也不多，左派領導更坐高級汽車去抗爭。⁹在很多文章裡，萬人傑都向讀者「揭露」了左派背後的利益交換，使社會主義者的「反英抗暴」仿似是一份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受薪職業。¹⁰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指，當身體展示出一種跟精神不協調、仿似機械般的不靈活性 (mechanical inelasticity)，便可以產生笑話 (Bergson 15)。萬人傑筆下的左派，正正有此特性：喊着社會主義的口號，卻配上一副由利益驅動的資本主義身體。¹¹

萬人傑也是如此諷刺左派的武鬥。以下的〈左道仔遇上左道王〉講述左派在市區放炸彈：

飛仔祥接受了歪咀勝一個鞋盒，歪咀勝叫他放在電車站 [.....] 兩張紅底 [筆者按：兩張 100 元紙幣] 落袋後，照指示，把鞋盒放下 [.....] 他到附近電話亭，打電話告訴警方：某處電車站有炸彈 [.....] 飛仔祥聽說過，向警方報告爆炸品所在，可以得到獎金 [.....] 飛仔祥馬上溜走，一拐彎，歪咀勝已在等著 [.....] 飛仔祥

⁹ 左派領導坐平治汽車去抗議，在其他研究中也有記載 (張家偉，《六七》頁 208)。

¹⁰ 例子尚有很多，例如形容左派領導生活奢華，「有三頭住家，自己的都是鴉勞恤，科岑鞋，食好彩煙」(《萬語錄》頁 8)。類似文章，可參考〈鬥委的典型生活〉(《左道》頁 12-14)。

¹¹ 這現象直到今天仍然持續。香港網民常常嘲諷愛國左派或建制人士，揭露和放大一些收費的愛國行動，稱收費的愛國者是不專業的臨時演員，更會用「霞姨」一詞而作嘲諷。「霞姨」是周星馳電影《喜劇之王》一個角色，專門負責招募臨時演員。

只好乖乖地還他兩張紅底。飛仔祥已夠左道，怎知遇上左道之王歪咀勝，棋高一著，不花一文錢，達到「鬥爭」目的，可以中飽私囊了。（《萬語錄》頁6-7）

這次「揭露」的，不僅是左派陣營背後的經濟計算，還有在幕前負責政治行動的主體——不是理想主義的學生和工人，而是收人錢財辦事的「飛仔」（黑幫流氓）。流氓借武鬥牟利的每個步驟，都被敘述成影像般的片段（如收取兩張紙幣、把鞋盒放下），構成電影般的敘事。文章既然把「左仔」描繪成一個滑稽的喜劇人物，也就無形中建構了一個好像電影觀眾般的讀者位置，使讀者像看喜劇般看著「左仔」的行動。¹²《萬語錄》沒有創造一些嘗試理解左派的想像空間，也沒有提及港英政府的暴力鎮壓。¹³當然，萬人傑根本就沒有意圖提供更複雜的思考和對話，只是匆忙地應對左派的文攻武鬥。

笑話不一定像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說的是一種顛覆。比力（Michael Billig）便認為，笑話使人感到羞恥，可以限制一些偏離社會秩序的行動和鞏固社會秩序（211-14）。¹⁴《萬語錄》嘲諷左派的文字，也是在支援殖民地秩序。

萬人傑的讀者：男性市民的集會結社

以上，筆者分析了《萬語錄》的文本性，呈現一位右傾文人的能動力——他偏離國民黨的文藝原則，塑造地方為本的作者形象和反共笑話，以召喚市民支持港英政府。以下，本文會討論《萬語錄》的社會性，即其消費者如何看它，及這如何形塑消費者（也同時是讀者和市民）之間的關係。筆者依賴的資料，來自2017年所作的訪問。受訪者向筆者表達的感受，固然無法完全代表五十年前的市民的聲音，而1967年的讀者如何看待萬人傑，尚需更多研究。但這些訪談內容，也可以證明一些市民被萬人傑打動過的深刻經歷，橫跨了五十年也沒有被完全遺忘。從訪談內容及分析可見，萬人傑的文字代表了勇氣，集結了一些義憤的男性市民，反證了市民不是鐵板一塊地「人心惶惶」。

¹² 類似文章尚有〈烏龍的左仔〉（《左道》頁49-50）、〈自導、自演、自拍〉（《萬語錄》頁63-65），罷工滑稽劇（《萬語錄》頁65-68）和〈明星與影迷〉（《萬語錄》頁111-13）等等。

¹³ 有關反英抗暴的愛國市民如何被港英政府打壓，可見張家偉的著作（《67年那些事》）。

¹⁴ 齊澤克（Slavoj Žižek）也認為笑話可以維穩，讓老百姓無傷大雅地發洩（vii）。有研究也指，冷戰時期於東歐流傳的笑話，是利秩序多於挑戰秩序（Speier）。在中國，林語堂在民國時期發明了「幽默」一詞以作為正經話和笑話之間的平衡點，修正了公共討論互相攻擊的混亂情況（Rea）。笑話如何在現代中國作為文化的控制和反抗，見戴維斯和梅卓琳編著的論文集（Davis and Chey）。

第一位受訪者，年約 70 歲的 M 先生，很快便把筆者引領到一個透過萬人傑而建立起來的讀者網絡。¹⁵ M 先生非常熱心，似乎為有後輩研究他們而感到高興。他說，萬人傑的讀者形成了一個萬人協會，後來又轉化成一個偶爾聯誼的萬人之友飯局，可以讓筆者參與。於是，筆者在新界沙田某公共屋村的酒樓，向十位約 70 到 90 歲的老人家（全是男性）查問有關萬人傑的故事，從消費者和讀者的主觀角度去了解萬人傑的社會性。¹⁶ 老人家說，1967 年時，他們是中學老師、小企業文員、銀行經理、小商人、司機及中學生等等，一些是在當時剛剛從廣東逃到香港的難民，一些生於香港，其中一位甚至聲言從來沒有踏足中國內地。他們宣稱大家本來互不相識，都是在當年因為萬人傑的文字而結緣，最後成立一個以聯誼性質為主的萬人協會，大部份是男性會員。1997 年前，他們因為害怕中共而自行解散，但直到今天仍然偶爾出來聊天。老人家還說，當年走在一起是出於義憤，感到社會不公義而生氣，集體捐款支持萬人傑。有些老人很懷念當時的聚會（圖二及三），更稱有次吸引了過千名市民參加。當筆者問及萬人傑及協會背後有否資助，他們都反覆強調自己是普通小市民，沒有政治背景，跟國民黨毫無關係，只是在身份上更認同自己是中華民國人。有些人也指，國民黨在香港的力量一直都很微弱，沒提供過甚麼支援。一方面，筆者有點懷疑他們是否真的毫無國民黨的支援；但另一方面，筆者也尊重他們的回答。而且，即使是有資助，這群老人在當時和今天的社會裡，也很難稱得上是有權有勢者。今天，萬人協會已停止運作，但在石硤尾耀東街一座有待清拆的舊樓，仍然保有其牌匾（圖四）。



圖二：萬人協會聚會。出自《鐵漢從傑：陳子雋先生紀念集》頁 71

¹⁵ 筆者得以約見 M 先生，全靠香港文學研究者、研究萬人傑文藝的專家李卓賢先生襄助，特此感謝。

¹⁶ 以下內容均出自筆者訪問，2017 年 3 月 21 日，沙田。



圖三：萬人協會聚會。出自《鐵漢俊傑：陳子雋先生紀念集》頁72



圖四：萬人協會在石硤尾耀東街的牌匾（筆者攝於2019年）

以上證明，一些男性市民在 1967 年透過購買及閱讀萬人傑而找到其志同道合者、進而集會結社。更進一步，《萬語錄》如何讓讀者得以抒發和重塑自己，使他們走出其個人或私領域而步向一個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老人家一致說，「老萬」為人嚴肅，笑料不好笑，往往「眼高手低」，但敢於嘲諷左派實在很需勇氣，幫不敢出聲的大家「出了一口氣」。讀者 S 更直指：

萬人傑是「無料」（筆者按：沒有實力）的。如果我要學習思想，會看牟宗三和錢穆。但我也非常敬佩萬人傑「無學識，有膽識」。

事實上，在一本悼念萬人傑的文集，大部份作者都沒有提及萬人傑有多幽默，而是反覆稱讚他是勇敢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例如金凌子，頁 80）。對萬人傑的支持者來說，笑料內容並不深刻，但說笑話此行動及形式本身卻象徵著勇氣，凝聚了不同讀者。讀者也因而找到國民黨八股以外的文化渠道，在黨國語言之外表達自己的感受，進而找到共鳴，互相連結。

結語：1967 年的市民

本文從暢銷書《萬語錄》進入 1967 年的歷史，解構知識分子生產政治性文化的模式及其文化市場，去理解當時市民的意識和活動。當六七研究都集中在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視角——例如通過暴動去理解港英的心理戰術，或揭示冒進的毛左如何違背北京「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治港原則——《萬語錄》則把我們引進被忽視的市民史。

但我們也不應把萬人傑視為「香港人」和「本土主義」的代表，把 1970 年代才出現的文化身份和 21 世紀才出現的政治論述去理解 1960 年代。萬人傑認同的是中華民國，只是不滿國民黨無法對香港提供足夠的政治支援和文化資源去反左，才運用及重塑香港居民的地方意識，把它轉化成反左的政治能量。萬人傑曾經提出，他自視為中國人，但由於左派常常煩人地指責不支持中共的就不算中國人，所以如果他只能二選一，他寧願當「香港人」（《萬人雜誌》頁 2）。他甚至羨慕新加坡成功反英殖而獨立，不介意將來有一個「香港國」的存在。可是，當時的萬人傑沒有提及受新加坡獨立啟發、在同時期由馬文輝領導的自治運動及香港民主自治黨。¹⁷當時的萬人傑，跟很多後來的香港知識分子不同——萬氏沒有公開顯示出追求城市民主、自主或獨立的意志，只想支援港英政府去壓制那些挑戰社會秩序的左派而已。

該如何理解一種只想地方秩序和生活方式都得以穩定的心態？它或者可以被視為狹隘的地方主義，甚至是被殖民的奴性；但在 1960 年代，它更像一種難民心理的表現。萬人傑常常指，香港是不錯的難民庇護所。他曾寫道，外國不是中國人的地方，而大陸也不是可以回去的地方，久居香港此「難民營」，便感到這即使是殖民地，還算是安定和自由的樂土（〈何處是樂土〉，《萬語錄》頁 85-93）。換言之，如果英國殖民主義和中國「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路線視香港為生財的商貿港，又如果反殖和有帝國主義傾向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視香港為國土被佔領的污點，那麼，萬人傑看到的香港，則是一個讓人活得自由安定的難民城市。透過萬人傑的文字及其所連結的社會網絡，我們看到一群香港市民如何自視為中華民國的國民或遺民，中國南端一隅的難民，及英國殖民地的居民，並視殖民地的秩序為自身生活的依據。當有人挑戰地方秩序，他

¹⁷有關馬文輝，見貝加爾的文章。

們走在一起為城市做些事，努力展現一些立場和力量。1967年重要，不僅因為那年有一場政治鬥爭，也因為它折射出一些在歷史上出現過的民間意識和活動，幫助我們感受這座城市的市民有何能動力——它受歷史制約、又同時創造歷史。

參考文獻

英文

- Bakhtin, Mikhail.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élè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rint.
- Bergson, Henri. *Laughter: An Essay on the Meaning of the Comic*. Trans. Cloudesley Brereton, and Fred Rothwell. København: Green Integer Books, 1999. Print.
- Bickers, Robert, and Ray Yep.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rint.
- Billig, Michael. *Laughter and Ridicule: Towards a Social Critique of Humour*. London: SAGE, 2005. Print.
- Carroll, Joh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1967 Riots and the Strike-Boycott of 1925-26."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Ed.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69-85. Print.
- Davis, Jessica M, and Jocelyn Chey. *Humour in Chinese Life and Culture: Resistance and Control in Modern Tim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rint.
- Freud, Sigmund. *The Jok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ness*. Trans. Joyce Crick. London: Penguin, 2003. Print.
- Ip Kai-yiu Kelvin. *Leftist Propaganda in the Hong Kong 1967 Riots*.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Print.
- Mulkay, Michael. *On Humour: Its Nature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Print.
- Rea, Christopher. *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rint.
- Speier, Hans. "Wit and Politics: An Essay on Laughter and Pow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5 (1998): 1352-1401. Print.
-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rint.
- Žižek, Slavoj. "Instead of Introduction: The Role of Jokes in the Becoming-Man of the Ape." *Žižek's Jokes (Did You Hear the One about Hegel and Neg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13. Print.

中文

- Pun, Linda. 〈萬人傑點滴〉。香港文化資料庫，2016年6月17日。摘取於2018年12月30日。

- 李少雲。〈香港左派工人的粵劇運動（1950-1970年代）〉。《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115-40。
- 李雪塵。《李雪塵回憶錄》。香港：三聯書店，2010。
- 貝加爾。〈馬文輝與香港自治運動〉。《思想香港》，第三期，2014。
- 周奕。《香港左派門爭史（增訂版）》。香港：利訊出版社，2017。
- 金凌子。〈懷念萬人傑先生〉。《鐵漢後傑：陳子雋先生紀念集》，編者不詳。香港：出版社不詳，年份不詳。頁80。
- 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
- 陳何智明。〈感慨前情往事如煙魂歸何處，愴懷傷永訣浮生若夢痛失所天〉。《鐵漢後傑：陳子雋先生紀念集》，編者不詳。香港：出版社不詳，年份不詳。頁7-12。
- 許崇德。〈攻心為上：香港政府應對「六七暴動」的文宣策略〉。《21世紀》147期（2015）：頁64-81。
-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 。《67年那些事：傷城記》。香港：火石文化，2012。
- 張詠梅。〈批判與同情——試論《文匯報副刊連載小說《港Q自傳》的「香港」想像〉。《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141-67。
- 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 萬人傑。〈香港人，香港貨，香港週，香港國〉。《萬人雜誌2》，1967。頁2-3。
- 。〈大題小做、高調低彈〉。《萬人雜誌1》。香港：萬人雜誌社，1967。頁30。
- 。〈發刊詞〉。《萬人雜誌1》。香港：萬人雜誌社，1967。頁1。
- 。《左道旁門》。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
- 。《萬人傑語錄》。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